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丛刊

新著国语文学史

凌独见◎著

丛书主编：陈文新 余来明

本册整理：方 宪 李艳华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新著国语文学史/凌独见著; 方宪, 李艳华整理.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21. 9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丛刊 / 陈文新, 余来明主编)

ISBN 978-7-5396-6881-9

I. ①新… II. ①凌… ②方… ③李… III. ①中国文
学—文学史 IV. ①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26444 号

出 版 人: 段晓静

责任编辑: 秦 雯

装帧设计: 张诚鑫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889

印 制: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0551)65661327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25.5 字数: 400 千字

版次: 2021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2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7ZDA243)阶段性成果。



前 言

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新著”系列教科书,《新著国语文学史》是其中之一,扉页有“中等学校用”字样。这部中国文学史受胡适《国语文学史》影响的痕迹较重,出版后受到的评价不高,长期以来也未引起文学史研究者的重视。然而,这是中国第一部以“国语”命名并且作为中学教材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我们只有将其置于20世纪初国语运动的具体历史语境中,才能深入理解其产生的文化背景及历史意义。

一、“国语讲习运动”的开展

国语运动是从晚清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场语言革新运动,它是一场开始于语言而着眼于整个社会文化革新的运动。1920年是国语运动的一个里程碑,“国语运动,在民国以前十多年已经发生,至民国九年以后才告成功”^①。这是被普遍认可的事实。从这一年开始,教育部下令在学校中推行国语。为培养师资,教育部开办国语讲习所,这对推广国语起到了关键作用,一场“国语讲习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所谓“国语讲习运动”,指的就是20世纪20年代初,以教育行政力量为主推动的,以开办国语讲习所为形式的一系列推广国语使用的活动。

这项活动是由教育社团率先开展的,随后获得官方行政力量支持全面推开。通过开办国语讲习所,不仅国语教育师资问题得以解决,更重要的是,一条向广大知识青年传播国语知识乃至新文化思想的渠道也得以形成。胡适等新文化人在国语讲习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同时也借机宣传、推广自己的主张,扩大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影响。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就是在这—历史背景中产生的。

^①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707页。

1910年,宣传和推广国语的社会呼声渐高,教育界做出了自觉努力,成立了一些组织,旨在促进国语的使用和标准的统一。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国语研究会”和“国语统一筹备会”。

1916年,“国语研究会”在北京成立,最直接的目的是促进小学国文教材实现向白话语体的转变。根据当时媒体的报道,“北京教育界中人,为改良初等小学校起见,发起国语研究会于本京”,报道还载有发起者会后征求会员书,其中说道:“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之起源,盖由同人等目击今日小学校学生国文科不能应用,与夫国文教师之难得,私塾教师之不晓文义而无术以改良之也……职是之故,同人等以为国民学校之教科书必用白话文体,此断断乎无可疑者……此同人等发起私会之旨也。”^①1917年,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召开,江苏、浙江、湖南等省都有关于国语教育的提案,江苏省教育会提出“各学校用国语教授办法”议案,请教育部酌用。次年(1918),教育部颁布了训令,北京、武昌、沈阳、南京、广州、成都六所高等师范学校附设“国语讲习科”,教授注音字母及国语,以培养国语教育师资。

1919年4月,在多方努力之下,“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与“国语研究会”的社会团体身份不同,这一机构被纳入官方教育行政体制之内,体现了教育部对国语教育的支持。应国语推广人士之请,教育部公布了《国语统一筹备会规程》。按照此规程,“国语统一筹备会”为教育部附设机关,筹备国语统一事项、推行办法。它的组成人员包括教育部指派职员如黎锦熙、陈懋治等,部籍学校推选的教师如钱玄同、胡适、周作人等,以及延聘的其他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

1920年1月,教育部同意了第五次全国教育联合会关于将国民学校“国文科”改为“国语科”的议案,通令全国学校进行国语教学改革,国民学校一律将“国文”改为“国语”,高等小学则视“国语”与“国文”同等重要,在教学

^① 长沙《大公报》1917年3月16日报道,参见李永春:《湖南新文化运动史料》,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5页。



中增加国语,减少文言。^①这是中国实施国语教育的先声,被胡适认为“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②。在行政力量的支持下,国语教育迅速推开。

此时,教育部也积极开设国语讲习所,并通令各省教育厅举办国语讲习所,组织国语统一筹备会。国语讲习所成为教育行政部门推广国语传习的重要机构。

1920—1922年,教育部共举办四期国语讲习所。1920年4月,举办第一期国语讲习所,招收各省区教育厅选派的学员约172人(官费、自费合计),其中包括中学师范毕业生或现任小学教员,为期两个月,考试毕业合格161人;1920年6月,举办第二期讲习所,招收各省区师范学校选派的现任国文教师,约141名学员,为期两个月,修业合格124人;1921年10月,举办第三期讲习所,招收大学文科、高师毕业生,师范本科或中学毕业有国语基础者,现任及曾任教师或具有同等学力者,各省区选送3人,剩余名额在北京考录,共招生约102人,为期三个月,毕业合格69人;1922年12月,举办第四期讲习所,投考录取,毕业54人。^③

同时,国语讲习在地方也迅速开展起来,受到地方军政、教育界的重视和教师、知识分子的欢迎。1920年,湖北省立国语讲习所第一期举办后,由于经费问题,本来无力举办第二期,但由于学员“向学情殷”“及各管教之热心”,由第一期的官费改为自费,继续举办。^④在日益高涨的国语讲习的推动下,国语运动迅速推进,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时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的路孝植不无感慨地描绘这种情景:“当民国八年,湖北能语者几人?今年九年,

① 1920年教育部颁令:“从本年秋季业起,国民学校的一、二年级都改用国语。”见胡适:《〈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胡适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258页。

② 胡适:《〈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胡适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258页。

③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民国丛书》第二编,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124—125页。

④ 雷乙丙:《国语讲习所第一次毕业志盛(续)》,《大汉报》1920年11月12号。

合高师所办者已有三次毕业,是传播之根基已定。”^①可以说,国语讲习所的开办对于国语运动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

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的联合,是这一时期国语运动大盛的主要原因。黎锦熙在《国语运动史纲》中将国语运动分成了四个时期——“切音运动”“简字运动”“注音字母与新文学联合”“国语罗马字及注音符号”^②。1920年初正是国语运动进行的第三期,也是运动发展的高峰期,其最大的特点是,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合流,语言和文学二者合力,共同形成了较大的社会文化影响。

国语运动起初并没有太大影响,从国语研究会会员数量来看,1916—1918年,会员人数由数百增加到1500余人^③,增长并不多,更遑论其社会影响。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语运动的重心在对于语言本身的理论问题的探讨和争论上,理论重于实践,并且,由于在国音的统一标准、国语与方言关系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国语的推广实践工作受到较大限制,停滞不前。

胡适率先提出了应对策略,指出国语运动发展的方向,应是国语的研究和国语文学“双管齐下”,在实践中推动国语的宣传、教育。他认为:“有些人说:‘若要用国语做文学,总须先有国语。如今没有标准的国语,如何能有国语的文学呢?’我说这话似乎有理,其实不然。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言语学的专门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说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这话初听了似乎不通。但是列位仔细想想便可明白了。天下的人谁肯从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里面学习国语?所以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虽是很要紧,

① 雷乙:《国语讲习所第二次毕业详记》,《汉口新闻报》1920年12月17号。

②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民国丛书》第二编,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3—4页。

③ 吴晓峰:《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决不是造国语的利器。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①正是以胡适为首的新文学倡导者高举起“国语文学”的大旗,才使得推行国语由一个最初局限于语言文化学者、教育界人士讨论的议题,成为一个经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洗礼后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化运动。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白话被应用于大量新文化书刊的宣传中,“国语的种子撒遍全国,国语的文学的价值,也就十分确定”^②。不仅国语和国语文学得以被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了解,并且,国语研究会会员数量在1919年激增至约9800人,1920年达到约12000人。^③由此可以看出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对于国语运动的推动。

从教育部国语讲习所的师资可以看到,除了语言学方面的黎锦熙、汪怡、王璞、钱玄同等,文学方面的胡适更是讲习所极受欢迎的教员。

从1920年第一期直到1922年第四期,胡适全程参与国语讲习所的教学。1920年教育部第一期国语讲习所开办,胡适在讲习所演讲了十余次,大受欢迎,应邀作《〈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在这篇序中,胡适再次强调了“建立国语标准的唯一方法”,就是推行国语应用,在教育、实践中逐步达成标准的统一,而非相反,以标准未统一为理由拒绝国语的推广。1920年第二期讲习所,胡适负责“讲读作文”课程。1921—1922年第三期、第四期国语讲习所,胡适主要讲授“国语文学史”课程。第三期国语讲习所授课期间,胡适在八个星期内编写了约八万字的十五篇讲义,总题为《国语文学史》,由于第三期讲习所在1922年1月结业,讲义只写到第十五讲《南宋的白话文》。尽管如此,胡适还是运用历史进化论观点对中国文学发展进行了重新阐释,构建出一个以国语文学发展史为线索的中国文学史框架,形成一套国语文学/

① 朱正:《胡适文集》第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43页。

② 乐嗣炳:《国语学大纲》,上海:大众书局1935年版,第188页。

③ 吴晓峰:《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活文学、文言文学/死文学的二元对立,此消彼长,进化演变的文学史话语,为推行国语找到了历史合法性依据。胡适的这种国语文学思想给当时的学员带来了极大影响。

第三期国语讲习所肄业的学员盛先茂在《传播国语的我见》中说:“由文言改语体,借注音字母为工具,来实行统一国语,这个举动……却有很长又很光明的历史可以寻着的,……《水浒》《三国》《西游》《金瓶梅》,不是三四百年前的作品吗?《儒林外史》《红楼梦》不是一百四五十年前的作品吗?我们要知道,这几百年来,中国社会里销行最广、势力最大的书籍,就是这些‘言之不文,行之最远’的白话小说。老实说来,这就是国语文学的历史的背景。这个背景,早已造成了《水浒》《红楼梦》,早已养成白话的信用了,时机已成熟了。所以国语文学能在最短的时间,收着很大的功效。”^①从这段话可以看到,胡适所提倡的国语文学思想在国语讲习所深入人心,而这些接受了新文化和新文学思想洗礼的年轻学员回到地方,也成为地方国语运动的先锋分子和中坚力量。1925—1926年,由于教育部人事变动等一系列原因,行政机关对于国语运动的态度趋于消极,国语运动也一时转入低潮,但20世纪20年代初在教育部推动下的国语讲习活动确实为国语运动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二、《新著国语文学史》的问世

《新著国语文学史》的作者凌独见,又名凌荣宝,浙江衢州江山人,有说因其眇一目,故号“独见”。凌独见幼年曾入私塾,高等小学毕业后因家贫未能升学,1914年春考入杭县小学教员养成所,1919年秋进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一师”学习期间,他经常发表时评,独立主办了《独见》周刊,对于五四时期新文化阵营“激进”的观点有所驳正,引起了时人的关注。^②1920

^① 李永春:《湖南新文化运动史料》,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2页。

^② 翟骏:《新文化运动中的“失语者”——论凌独见与五四时代》,《学术月刊》2016年第4期。



年,凌独见从“一师”毕业,任高等小学教员,由于在报刊媒体上的活跃,他得到了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夏敬观的赏识。1921年9月17日,凌独见成为浙江省教育厅的办事员,10月,他被派往北京参加教育部举办的第三期国语讲习所培训,《新著国语文学史》就是他这次培训学习后产生的成果,其蓝本是《国语文学史纲》。

凌独见撰写《国语文学史纲》,与浙江省的国语讲习活动密切相关。他就读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曾率先进行国文科改革。1919年秋季,时任校长经亨颐就决定,“一师”附小的国文科教授一律改用白话,夏丐尊、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等教师编纂了配套的国语教材。不过,这一改革随后遭到守旧势力的打击,“一师”和经亨颐遭到查办,夏丐尊等人也受牵连。^①

然而,随着1920年教育部关于国文科改国语科训令的颁布,浙江的国语运动也迅速回暖,自县至省踊跃举办国语讲习所,各地不仅想要解决国语师资急缺的问题,更将国语教育视为一种文化新潮,唯恐落后,“自教育部通令国民学校改为语体,司教育者对于此项教授尤形竭蹶。现浙省教育先进之县,除特派人员前往肄习国音外,并多购留声机,以资熟练。在彼通都大邑,素称文化发达之区,尚且汲汲讲求,而我山陬僻壤,当此潮流鼓荡之际,詎可拘拘自守?”^②这段话反映了当时浙江地方教育界对国语教育的迫切需求。

浙江省教育会早在1918年8月就曾举办了注音字母讲习会。1920年7月20日至8月20日利用暑假开设国语讲习会,由各县保送学员约100人参加学习。这两次讲习班时间较短,学员有限。为进一步推广国语,1922年初,浙江省教育会积极筹办国语传习所,推选张行简、叶兆骏、许倬云为干事,聘请教育部国语讲习所毕业的范寿民、凌独见、张倬、郑焕卿、费树人为讲师,开设课程有教学法、言语学、国语发音学、国语文学史、文法、音韵学等^③,1922

① 张彬:《浙江教育史》,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45页。

② 见《浙江教育月刊》1921年第6期,转引自张彬:《浙江教育史》,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46页。

③ 张彬:《浙江教育史》,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45页。

年3月13日开学,为期十周。

由于受教于教育部国语讲习所,得亲炙于胡适、黎锦熙等新文化名家,凌独见俨然也被视为国语文学专家,受聘为国语文学史讲师。为教学之需,他编著了讲义,在查阅《四库全书》等资料的基础上,大致在1922年夏完成了《国语文学史纲》,由杭州寿安坊印行^①,全书约381页,前有自序以及夏敬观、马叙伦所作的序。

在自序中,凌独见叙述了写作的缘起:

今年三月里,浙江省教育会举办国语传习所,邀我去讲国语文学史,因为义务事情,不好推辞,故当时就慨然应允。《国语文学史》胡适之先生已编到十四讲了,大可拿它来现成用一用,为什么要另编呢?这个里面却有两个缘故:第一,我和胡先生意见上有大不同的两点,1.他只主张从汉朝说起,我却主张从唐虞说起。2.区分时期上,他只分两期,北宋以前为第一期,南宋以后为第二期;我却认为,必须要分四期,自唐虞到周为第一期,自秦到唐为第二期,自宋到清为第三期,民国以后为第四期。第二,我是一个很想努力读书而又极懒惰读书的人,要想克制这个“懒惰”,只有利用机会。这本东西,就是激励鞭策自己,一面讲授,一面读书,杂乱编纂成的,这是我编纂这部书的缘起。^②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凌独见编写这部《国语文学史纲》的性质是授课讲义,这与他为浙江省教育会举办的国语传习所授课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从时间上看,传习所授课从3月13日起,历经10周,大约在5月下旬结束,本书随后出版,应是根据授课内容稍加整理编辑而成。第二,凌独见编

^① 瞿骏认为,《国语文学史纲》出版的时间最早不超过1922年8月中旬,参见瞿骏:《“新青年”凌独见》,《读书》2015年第10期。

^② 凌独见:《国语文学史纲》自序,杭州寿安坊1922年版,第6—7页。



写《国语文学史纲》，深受胡适的影响，而又有所区别。可以看出，他的文学史是以胡适著作为参考，同时，他强调和胡适意见不同的两点，即国语文学史的起始和分期。第三，他编写这部文学史讲义的另一目的是为督促自己“读书”，故而这部文学史在作品文献的搜集上比较丰富。

1923年2月，《国语文学史纲》由具有全国影响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再版发行，书名改为《新著国语文学史》，增加了黎锦熙所作的序，并在封面上标明了“中等学校用”的字样。

《新著国语文学史》是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丛书之一，这套以“新著”命名的中学教科书共十五种二十六册，除了历史、地理、图画、公民须知等科目内容之外，语言文学学科是重头戏，包括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一册、何仲英《新著中国文字学大纲》一册及《新著中国文字学大纲参考书》一册、汪怡《新著国语发音学》一册、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一册以及供师范学校用的黎锦熙《新著国语教学法》一册。这样一来，籍籍无名的《国语文学史纲》摇身一变，成为商务印书馆“新著教科书”丛书中的一员，其身价不可同日而语。

这套中学教科书的出版，与1922年新学制改革有关。1922年9月，北洋政府召开全国学制会议，随后于11月1日发布《学校系统改革令》，即“新学制”，又称“壬戌学制”，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学制，是中国教育制度从近代向现代转变的标志。

新学制对中等教育阶段做出了较大的调整，修业年限从四年改为六年，分为初、高两级，初中阶段实行选课制，高中阶段实行分科制，设普通、农、工、商、师范、家事等科，普通科又分为文科组、理科组。1923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公布了《中小学课程标准纲要》，根据该纲要，初中课程分为必修课、选修课，高中课程分为公共必修课、分科专修课、纯选修课。在课程设置上，语言文学学科方面，发布了吴研因起草的《小学国语课程纲要》，叶圣陶起草的《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胡适起草的《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国语课程纲要》《高级中学第一组必修的特设国文课程纲要》。初中、高中必修课都包含国语科，高中分科专修则反映不同学科的课程特色。

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国语科已全面取代国文科,打破了旧有国文科以文言为中心的格局,形成语体文占据绝对优势的局面,在教学目的、教材内容上,贯彻了“言文一致”、推广白话文的原则。其二,高中普通科下设的文科组课程中,“中国文学史”被纳入了必修课。胡适起草的《高级中学第一组必修的特设国文课程纲要》中规定了两个部分:一是“文字学”,二是“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课程目的包括:“1. 使学生略知中国文学变迁沿革的历史。2. 使学生了解古文学与国语文学在历史上的相当位置。3. 引起学生研究文学的趣味。”内容则是:“1. 第一时期:从《诗经》到《史记》。2. 第二时期:从司马相如到初唐四杰。甲、贵族文学。乙、平民文学。(南北乐府)3. 第三时期:唐五代。甲、古文。乙、韵文。丙、白话文。4. 第四时期:两宋与金元。甲、古文。乙、韵文。丙、平民文学。(一)曲子与戏曲。(二)小说。5. 第五时期:明与清。甲、贵族文学与科举文学。乙、平民文学的成熟时期。小说。6. 革命与建设。”^①

可以看到,“中国文学史”课程内容,基本上就是胡适所倡言的“国语文学史”。随着新学制与新课程标准的颁布,各种配套教科书也应运而生。阮真曾谈到当时国文教科书的情况:“到了民国十一年(1922),改行现行的新学制,教科书又经了一番改革。在国文教学上受了提倡语体文,创造新文艺,灌输新思想,和研究国学、整理国故各种思潮的影响,国文教科书的形式上、内容上都不能不改变了。”^②学校和出版市场对于国语(白话)文学史教科书的需求也变得十分迫切。胡适介绍当时因教学之需,他的国语文学史讲义被各处翻印的情况:“我的朋友黎邵西先生在北京师范等处讲国语文学史时,曾把我的改订本增补一次,印作临时的讲义。我的学生在别处作教员的,也有

① 黎锦熙:《新著国语教学法》,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5 年版,第 258—259 页。

② 阮真:《几种现行初中中文教科书的分析》,《岭南学报》1929 年第 1 卷第 1 期。



翻印这部讲义作教本的。”^①黎锦熙也承认,“学校里要教国语文学史的,想得到胡先生原来的讲义的还很多”^②。不过,当时忙于诸多事务的胡适“始终不能腾出工夫”将其国语文学史讲义修订出版。

经过1920年教育部国文科改国语科改革和1922年新学制改革,反应迅速的大型出版公司立即着手赶制适应新学制的教科书。从1922年末起,商务印书馆新学制适用教科书陆续出炉,多数在1923—1925年间初版。^③在这种情况下,凌独见的《国语文学史纲》显得十分应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商务印书馆将其作为中学文学史课程配套教材《新著国语文学史》出版。

三、《新著国语文学史》的价值取向

从思想上看,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无疑受到新文学观念的影响,其最直接的来源是胡适的国语文学思想。

关于文学的功用、目的,可以明显见出凌独见的新文化立场,他是完全站在“文学革命”追随者的立场来写这部文学史的。“文学革命”的意旨在于通过文学改造国民思想、更新社会文化。凌独见认为,国人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文学当作消遣品看待”,他眼中的文学,是“改造社会的原动力”,“因为文学有这种伟大的感动力,所以它的结果,能够变更民众思想;思想一变,举动言语行为随之而变,因此,革命家目为‘革命种子’”^④。

从一个文学与文化“革命者”的思想立场出发,关注和研究中国文学本身并非是他的目的,知“旧”方可维“新”,或者说,从传统文学发展变迁的历史中为新文学的建设寻求合法性依据,才是其意图所在。他认为,“要建设新

① 胡适:《白话文学史》序,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7页。

② 姜义华主编、曹伯言编:《胡适学术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页。

③ 石鸥、吴小鸥:《简明中国教科书史》,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第77页。

④ 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4页。

文学,必须从研究旧文学入手,必须要晓得文学进步的历程,以及沿革变迁的前因后果。文学史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材料供给我们的,我们研究了文学史,才知道今后文学的趋势,才可建设新文学的方针,所以研究文学史,是建设新文学必须的准备”^①。这是我们阅读和评价凌著文学史要首先澄清的问题。

具体来说,凌著文学史所受的直接影响来自胡适。无论是研究国语文学的历史逻辑,还是国语文学史的整体架构、具体表达,胡适的影子都清晰可见。

第二编关于“国语文学”的叙述,最明显体现出胡适的影响。例如,在谈到“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国语文学史”时,凌独见说:“历史教训我们,文学要用‘国语’作的,才有生命,才有价值,才受世人的欢迎。社会上为什么爱看《水浒传》《红楼梦》呢?因为这两部小说是白话来作的。为什么爱读李太白的诗、李后主的词呢?因为他们俩的诗词,是用白话来作的。中国的诗,谁都知道唐宋的最好,好在哪里?就因为它‘明白如话’。因此我们要研究‘国语’文学史。”^②

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1918年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的一段话:“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道:这都是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作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作的……我们为什么爱读《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呢?因为这两首诗是用白话作的。为什么爱读陶渊明的诗和李后主的词呢?因为他们的诗词是用白话作的……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③可以说,从“国语文学”的新角度、新眼光重构中国文学史是胡适的创造,这种思维的立场和逻辑被凌独见

① 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4页。

② 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5页。

③ 朱正编选:《胡适文集》第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41页。



继承。

在整体构架上,凌著以语体文学、平民文学的发展为线索贯穿起来,体现了胡适的新文学思想。

凌独见将国语文学史分为四期:第一期唐虞到周,是“创造的”“国语的”文学;第二期秦到唐,是“摹仿的”“脂粉的”文学;第三期宋到清,是“偶然的”“游戏的”文学;第四期是民国(西历一九一二)以来,是“有意的”“平民的”文学。除去第四期是对民国以来国语运动和新文学发展的介绍,前三期是对中国文学史的叙述。

第一期文学被他评为是“创造的”“国语的”,是由于其时言、文尚未分家,内容也较质直,其评价标准是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项原则”,核心是反对摹古、用典,他对这一时期文学的典奥问题做出了创造性的阐释。

上古至先秦文学时常被评价为雅驯典则,也是后世复古者追摹的对象,但是凌独见认为:“我们欣赏唐虞的文学,觉得胸襟很阔大,气象很雄浑,风神很敦厚,至于意思的质直,体气的硬强,行文的简洁,这是由于时代的敦朴,人智还未开,言辞尚稀少的缘故,并非故意作成这种样子,后世不明这层意思,竭力追摹,断无是处。”^①并且,这时的文学:“你说过的话,我不引用;我说过话,他不引用。正是尔为尔,我为我,各树一帜,各执一说。本来文学应该贵乎独出心裁,切忌抄袭陈言,这一期的文学,这种色彩最浓。……这一期的文学,是‘创造的’,后人以善于运用‘典故’为能,真不足训。”^②

第二期叙述从秦到唐的文学发展,体现了对平民文学和语体文学的推崇,尤其重视汉乐府、南北朝民歌。例如,他认为“乐府中最伟大的杰作,自然要推《庐江小吏妻》……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最精彩的一篇东西”^③;

① 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3 年版,第 34 页。

② 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3 年版,第 35 页。

③ 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3 年版,第 45 页。

谈到南北朝文学时,认为“这一时代的平民文学,可载入国语文学史的材料,是比贵族文学要来得多,单是《子夜歌》就不下二百首,这里面所表现的,全是青年儿女的恋爱”^①。南北朝民歌的文学价值得到肯定,“《子夜歌》描写女儿的心事,可算尽表现之能事了”^②,北朝民歌的代表《木兰诗》则被盛赞:“女子中有个木兰,女子增光不少;文学中有了《木兰诗》,文学也增光了不少!”^③

唐代文学部分叙述了唐诗初、盛、中、晚四期的发展,观照的角度也是白话文学。值得注意的是,在评价上,他一反前人论调,对晚唐诗的评价较高,认为历来评唐诗的人贬低晚唐诗:“何非是因为这一期的诗太俚俗了。太俚俗,换句话说就是纯粹是白话了,这样说来,古文文学史上的晚唐,就是国语文学史上的盛唐了。”^④他认为晚唐是“国语文学”的“盛唐”,代表作家是杜荀鹤、“三罗”等人。对盛唐、中唐诗歌的观察角度也是如此。盛唐诗推崇李白、杜甫,理由是他们的一些诗具有白话化的特征,“他们值得我们仰慕的地方,全在那些白话的诗,原来李杜都是平民诗人,他们过的生活是平民生活,平民生活非常曲折,要描写出来非得用白话不行,因此他们的诗都白话化了”^⑤。中唐诗也得到了较高的评价,所选元稹、刘禹锡、张籍、贾岛、姚合、孟郊等人的诗,“首首和说话一样明白的,也是首首脍炙人口的,可见诗定要白话作的,才有价值”^⑥。中唐诗人中,白居易被认为是“这一时期最大的诗人”,因其“白话的色彩更浓厚”^⑦。可见,他评价唐诗的重要标尺是语言的白话程度。

第三期文学从宋到清。凌独见评价这一期文学是“偶然的”“游戏的”,

① 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3 年版,第 71 页。

② 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3 年版,第 72 页。

③ 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3 年版,第 78 页。

④ 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3 年版,第 113 页。

⑤ 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3 年版,第 87 页。

⑥ 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3 年版,第 106 页。

⑦ 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3 年版,第 106 页。